

「儒学与现代社会丛书」第二辑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郭 沂

Sasa Josifovic

Asuman Lätzer-Lasar 编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

安徽省“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ZHISHI YU LUNLI DE XINGSHANGXUE JICHU

丛书主编：蒙培元 陈 炎

丛书副主编：黄玉顺 干春松

知识与伦理的 形上学基础

我们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促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全球哲学，这种全球哲学是超越比较主义的，但又植根于整个哲学史（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史），同时这种哲学史能够为哲学、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开创新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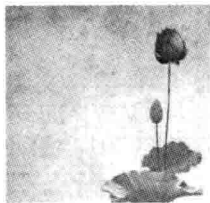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儒学与现代社会丛书」第二辑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资助



知识与伦理的 形上学基础

丛书主编：蒙培元 陈 炎

丛书副主编：黄玉顺 干春松

郭 沂 等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伦理的形上学基础 / 郭沂等编.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12-07451-7

I. ①知… II. ①郭…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0940 号

知识与伦理的形上学基础

郭 沂 Asuman Lätzer-Lasar 编

出 版 人: 胡正义

丛书策划: 丁怀超

责任编辑: 周子瑞 方贵京

封面设计: 宋文岚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制 版: 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合肥芳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5.5 字数: 170 千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2-07451-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说明

如果把被称为“第一哲学”的形上学作为哲学的命脉和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根据说,中华和德意志是世界上两个最富有哲学原创性的民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哲学一直未能进行充分而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2008年9月,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郭沂作为特邀代表到德国西部城市埃森参加了“第21届德国哲学大会”,并作了题为《知识、价值与生活世界》(Knowledge, Value and Life-World)的讲演,引起了一些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与关注。

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郭沂教授又应邀担任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设在科隆大学的形态学国际学院的Fellow。这是一个高等研究中心,重点探索文化知识如何体现在具体形式中,包括分析文化赋形的生成、动力、媒介等,这就是所谓的morphom。对morphom的研究,文化比较分析尤其重要,这正是学院每年从世界各地邀请大约十位卓越学者从事交流和研究的原因。在这期间,郭沂教授在埃森会议讲演稿的基础上完成了《知识与价值的形上学基础——道哲学要义》一文。

为了回应郭沂教授的道哲学(Daoic philosophy),促进中德哲学的交流,2011年6月24至25日,形态学国际学院与科隆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了题为“中欧哲学中知识与伦理的形上学基础”的英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爱尔兰、瑞士哲学界的十三位学者提交了论文并作了主题发言。由于这些论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学院决定结集出版,并责成具体操办会议的郭沂教授、萨沙·约西弗维奇 Sasa Josifovic 博士(科隆大学哲学系)和蓝天 Asuman Laetzer-Lasar 博士(形态学国际学院)担任编辑工作。该英文论文集最近已由德国 Fink 出版公司出版。

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中德哲学之间的对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与会学者深受鼓舞,希望将这种对话进行下去。在科隆大学哲学系 Claudia Bickmann 教授和郭沂教授的努力下,德国公民教育学院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于 2012 年 7 月 17 至 20 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图岑 Tutzing 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理性与道德的基础”的中德哲学对话会议。可以说,这是科隆会议的继续。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中文论文集,选录了上述科隆会议的九篇论文,包括郭沂教授的《道哲学要义》、阿伦·盖尔教授的《道哲学与过程形上学:克服西方文明中的虚无主义》、蒂尔曼·波舍教授的《哲学的权威——对郭沂〈道哲学要义〉的批判性讨论》、萨沙·约西弗维奇博士的《自由的形态》、保罗·柯本教授的《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的认识》、巩特·佐勒教授的《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对郭沂教授的现代主义回应》、克里斯丁·柯瑞林教授的《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价值的理性基础》、拉尔夫·韦伯博士的《让含蓄的东西明确——对郭沂东西方哲学讨论中某些比较断言的一种分析》和斯蒂克勒教授的《人性与战争文化》。另外,克里斯丁·柯瑞林教授的图岑会议论文《先验哲学中的价值与实践——对理性体系的挑战》和雷纳·恩斯卡特教授的《德性与知识——如何开展儒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道哲学,故一并收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科隆会议的情况,我们还特意收录了萨沙·约西弗维奇博士和阿伦·盖尔教授合作撰写的英文版绪论和郭沂教授的《回应道哲学——中西哲学对话的一个案例》一文(原载《哲学动态》2012 年第 2 期)。

编 者

2013 年 10 月

英文版绪论

[德]萨沙·约西弗维奇、[澳]阿伦·盖尔 著 郑颖 译

《知识与伦理的形上学基础》这样的题目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加入当前知识论和伦理学的论战。形而上学在这些辩论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现在很少有杰出的哲学家会试图为规范性创造基础,做出形而上学的知识或道德伦理的判断。但哲学超越了时尚和潮流,它是深深扎根于整个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并从中获得灵感的一种追求。与现今关于理性、规范、判断和行为的大部分理论相比,本书的作者们更着眼于通常分析哲学家不会涉足的古典哲学的论题和理论。例如郭沂的主题论文,强调了人性论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理解或者研究中国哲学都应以人性论为中心。此外,郭沂认为现在应该保留如此重要的哲学主题。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不同的传统和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种人性论,这是我们作跨文化研究的条件。再者,如果哲学要保持与人类有关并且要进步发展的话,我们就必须关注这个主题。每种生物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潜能,而“生命的意义”在于充分实现这些潜能,郭沂所提出的为人类提供“精神家园”的人性论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虽然对人性的关注为跨文化的哲学交流奠定了基础,而如何定义人性又反过来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书的大多数作者,比如郭沂教授,对中欧文明的形上学和哲学史都有丰富的知识,都在致力于研究这些更为实质的论题。本书涉及这些论题,为所谓的东西方哲学的辩论做出了贡献。

书中包含着作者们之间的争论,有些站在中国哲学传统的立场,有些则具有浓厚的欧洲哲学背景,但与以往不同,我们选择以纯粹的中国哲学立场为起点,邀请郭沂提供一篇文章,来介绍其“道哲学”概念和理论,同时有意选择在传统欧洲哲学(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来对郭沂的观点作出回应。本书就是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及其会上所作的讨论的结集。虽然很多参与者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研究,但首次遇到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邀请哪些人参加,目的是引发对中西文化所共有的实质话题的讨论,并借此发起一场跨国、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对话的参与者也包括非哲学界人士。我们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促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全球哲学,这种全球哲学是超越比较主义的,但又植根于整个哲学史(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史),同时这种哲学史能够为哲学、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开创新的视野。

这次对话旨在促进跨文化交流,因此首先要对不同传统中的重要论题和方法都持开放的态度。如果一个跨文化的国际会议声称应该重视中国传统但同时却坚持“当代哲学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衡量对中国学者来说重要的方法和论题,那么这种会议是不公允的,不利于哲学的跨文化交流。而在此前,这种偏见非常普遍。欧洲哲学家过去承认中国和印度有着各自坚实厚重的文化历史,但出于欧洲沙文主义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中印这些文化传统可以被称为哲学。

然而,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挑战着传统的哲学认知方式。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学者一直拒绝承认欧洲哲学家(特别是那些具有海德格尔传统的哲学家)所提出的论断:即哲学源于希腊语言文化,因而它代表了欧洲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并由欧洲哲学家传入其他文化。海德格尔派的学者非常武断地声称,德语在语言上的优势支撑并延续了希腊传统。很显然,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印度和中国无疑拥有厚重的哲学传统。对中国古典哲学家的哲学特质的了解不足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是由汉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引进的,因此这些著作里的哲学特质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和理解。

汉学家能够阅读、翻译和分析中国古典著作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但他们很少有人能够提出深刻的哲学问题并应用哲学方法去分析这些著作的哲学内涵。因此，西方世界认同中国的文化历史却否认其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上，郭沂和成中英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些哲学面向。我们承认，由于缺乏对彼此传统中的哲学文献的了解，任何中欧哲学家之间的对话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在西方世界，多数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至多是一知半解。他们知道儒家、道家和佛家并驾齐驱，或许也了解一些诸如孟子、朱熹和王阳明这样的古典哲学家，但仅此而已。因为西方哲学家无法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传统，所以他们即使对中国文化表示同情也无法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郭沂的文章告诉我们还有更多更深刻更让人惊叹的东西值得发掘，也展示了根植于古代周王朝的中国哲学思想具体的发展过程。随着儒学的发展，中国哲学由孔子“仁”和“礼”的统一演变为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但这仅是古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哲学复杂、漫长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郭沂告诉我们“道”的特定的历史和相关性。在西方，“道”被认为是代表“道家”的一个特定概念。郭沂提出“道”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尽管它有特定的含义。对于本书，成中英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基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特殊理论，这个理论对当今西方哲学界争议性较大的论题如古德曼的新归纳之谜、盖梯尔问题和异态一元论都能提供解决之道。

任何促进中西哲学对话的努力都会遇到一个重大挑战，即原著的翻译问题。像多数哲学家一样，书中作者们都认为对于完全理解其真正的哲学内涵而言，能够读懂原著不仅是有帮助的，而且是必须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西方学者几乎都不能通晓中文，实际上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很少讲汉语，而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专家也不讲英语、德语或法语。对西方哲学家来说，理解用中文写成的哲学著作比理解任何一种西方语言都要难很多，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汉语有着不同的方言，诸如北方话、闽南话、粤语和吴语等，但它们的书写形式是完全相同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而

非音节文字,它和以上方言并不对应,书面语和口语在词汇和语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汉语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像欧洲罗马文明崩溃和中世纪社会垮台这样的事件所导致的间断,但依然经历了甲骨文、周朝先贤语言、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家的白话语言和现代文学。但汉语最近发生了一次改变。20 世纪初期,一场缩小书面语和日常“白话”之间差异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打破了“文言文”的垄断地位并使其边缘化。源于 12 世纪以来小说和话剧的白话的书面语,虽然被文人学士所轻视,却压倒了古典中的文言文,成为书面语的首选。现在,文言文只有专家们才会去研究,而这些文言文,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要理解起来也绝非易事。

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气馁。在翻译诠释中国著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说明,即使以前最杰出的著作也存在翻译上的局限,这可以让我们有创造性的回应。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解古代中国的典籍涉及的不仅仅是要意识到自己已经持有的偏见。要理解一千多年来人们为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在世界的位置而所付出的努力,探寻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历史下如何生活与沟通,这需要大量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工作。要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进行真正有意义的研究,需要一种能够把中西方哲学文化互相解释的新思维方式。西方哲学家参与中国哲学的研究涉及参与和形成一种全球对话,这种对话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哲学。正如这次对话的参与者离不开他们各自的教育背景,这样的全球性的哲学同样离不开多元化的传统,因而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涵盖一切传统的新传统。我们不愿去翻译,我们更愿意去创造。虽然我们正在进行哲学辩论,但我们的目的却是创造哲学。

(萨沙·约西弗维奇 Sasa Josifovic:德国科隆大学哲学系;阿伦·盖尔 Arran Gare:澳大利亚斯威本 Swinburne 大学人文学院
译者单位: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

目 录

说 明	(001)
英文版绪论	[德]萨沙·约西弗维奇、[澳]阿伦·盖尔(001)
回应道哲学——中西哲学对话的一个案例	郭 沂(001)
知识与价值的形上学基础——道哲学要义	郭 沂(016)
道哲学与过程形而上学：克服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	[澳]阿伦·盖尔(083)
哲学的权威——对郭沂《道哲学要义》的批判性讨论	[德]蒂尔曼·波舍(106)
自由的形态	[德]萨沙·约西弗维奇(115)
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的认识	[荷]保罗·柯本(131)
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对郭沂教授的现代主义回应	[德]巩特·佐勒(142)
西方哲学中知识和价值的理性基础——评郭沂的《知识与价值的形上学基础——道哲学要义》	[荷]克里斯丁·柯瑞林(149)

先验哲学中的价值与实践——对理性体系的

挑战 [荷]克里斯丁·柯瑞林(162)

德性与知识——如何开展儒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

对话 [德]雷纳·恩斯卡特(182)

让含蓄的东西明确——对郭沂东西方哲学讨论中

某些比较断言的一种分析 [瑞士]拉尔夫·韦伯(196)

人性与战争文化 [美]R.N.斯蒂克勒(207)

回应道哲学

——中西哲学对话的一个案例

郭 沂

哲学是文明的核心,故而哲学的对话才是文明之间的深层理解。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同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基本上局限在汉学界,而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也十分隔膜。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哲学家之间的直接对话,显得尤为重要。令人欣慰的是,为了回应笔者近年来提出的道哲学,2011年6月24—25日,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设在科隆大学的形态学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es Kolleg Morphomata)与科隆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了题为“中欧哲学中知识与伦理的形上学基础”的英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数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爱尔兰、瑞士哲学界的十三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这为中西哲学对话提供了舞台。

不管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在欧洲哲学史上,作为“第一哲学”的形上学都曾是哲学的命脉和理论基础,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即以笔者的《知识与价值的形上学基础——道哲学要义》为讨论文本,就中国和欧洲的形上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宇宙论、本体论、人性、知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等哲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

一、道哲学与斯多葛学派之比较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哲学的正统性何在?这

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西方哲学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从他们对道哲学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略窥一二。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教授、德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蒂尔曼·波舍(Tilman Borsche)在题为《哲学的权威——对郭沂〈道哲学要义〉的批判性讨论》一文中提出，“道哲学”这个概念与“哲学”的构成问题关系尤为密切，看起来与斯多葛学派哲学中同一个问题的相关概念十分接近。他认为，道哲学的“哲学”概念包含所有人类精神活动，并进一步分为本性、理论和实践等领域。在这个框架下，他从三个方面对道哲学和斯多葛学派哲学进行了比较。

首先，道哲学和斯多葛学派关于哲学的界限问题。道哲学和斯多葛学派关于哲学构成的看法具有对应性：值—伦理学；气—物理学；理—逻辑学。二者的不同在于，道哲学认为值、理、气存在等级的差异。值地位最高，是另外二者的目的和合理性依据。而斯多葛学派用几个比喻来讨论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例如，哲学被比喻为一个花园，其中逻辑是保护这个花园的院墙，物理学相当于以枝丫承载果实的果树，但只有伦理学才代表果实，即拥有这个花园的目的。可见，在道哲学看来，物理学和逻辑学看起来只有辅助性功能，但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看，这两个领域有其自己的价值，并行施自己的权力。

其次，关于道哲学和斯多葛学派的方法论问题。斯多葛学派以“教条主义的”哲学而闻名。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是智者。他们不是探索者，而是博学者。他们了解事物，并以其教育他人。其哲学学说为上述的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显然，哲学首先是一种学习和教育的方式，其最主要的结果是真正的知识。道哲学和斯多葛学派哲学的相似性，不仅表现在其概念上及对哲学构成部分的看法和许多学说方面，更表现在其形式上。道哲学是一种纯粹的教条主义的阐述，其支持者会以之为真理。面对可能的怀疑，这种阐述将如何为自己辩护呢？其方法有二：一是求助于中国传统权威，诸如孔子、孟子、老子、朱熹等；二是求助于看起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自

然证据的事物。古代中国的权威和自然证据这些资源,并非不合理。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呢?自然证据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而权威需要论证,但郭沂提醒我们最普遍和根深蒂固的信仰通常有宗教根源。

第三,道哲学的目的,是试图教导我们,这和探求真理为己任的哲学是有距离的。为什么西方哲学的发展没有依赖于斯多葛学派哲学?事实上,哲学的发展是靠批判的,有时候甚至需要迈出革命性的步伐。在西方世界,哲学家越来越不愿意认定哲学真理。这意味着在漫长的历史中,教条主义思想在哲学领域没有前途,将来仍然没有前途。尽管如此,教条主义概念总是不时出现,而对它们的批判也总是立刻随之而来,并将其扫除,或迫使它应对我们面临的一些具体的哲学问题。外行把这种哲学态度称为“虚无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的结果,这个传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形而上的体悟。

蒂尔曼·波舍教授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作为这种教条主义学说的提倡者,郭沂可能靠什么权威来阐述其思想的呢?一、是靠神的权威吗?郭沂肯定不是这样。二、靠理性自然光辉的权威吗?郭沂可能也会作出否定的答复,因为这过于接近“西方”理想主义了。三、是靠中国传统的权威吗?有时候看起来是这样。于是作者就要面临托马斯写作《反异教大全》时所面临和讨论的相同问题。作者的出发点也许是对目前人类状况的批评性评价,即我们正面临着一场人类危机和哲学危机,而道哲学看起来提供了一套挽救这场危机的方案。这种理论框架以及这种伦理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可敬的和有意思的,它的确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道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

和蒂尔曼·波舍教授的强烈批评态度不同,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道哲学与西方主流哲学尤其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科隆大学的萨沙·约西弗维奇(Sasa Josifovic)博士在题为《自由的形态》的报告中,从自由的角度,将道哲学放在弗里德里希·席勒和康德哲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他指出,长

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哲学和文化,尤其儒家道德哲学仅仅建立在一系列规范和责任之上,而非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如何能够发展我们的本性?他认为,在我们本性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是一个必然条件。

弗里德里希·席勒也曾经提出过作为“美好灵魂”的意志结构,但他对我们实现这种教育理想的能力表示怀疑。郭沂的道形上学包含道体、性体、心体三个部分,而各个部分又含有值、理、气三种内在的基本因素,认为心为一太极,并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修行逐渐地克服我们生理本性和道德本性之间的冲突。

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自由指依照不同层面的目的和准则而行动的能力。这些目的代表我们自我决定的意向,通常是在感官喜好的基础上被赋予我们的。但是,相对于动物,我们并非必然地受这种倾向的驱使。相反,我们能够预知我们行为的可能结果,并考虑这种结果的吸引力,从而能够在预知一个结果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克服一种现成的情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称这种克服现成感官趋向的能力为“自由意志”(arbitrium liberum),这是他的自由理论的一个特点。如果我们自由地决定我们意志的内涵,那么我们就能够讨论一种更高级的自由,这就涉及一种代表我们自发性真正表达的能力。在康德看来,这就是理性的能力。没有道德准则思量的行为,确实表现在某种实践自由之中,但它并不代表实践自由的最高级形式,它也完全不代表人类自主和意志自我决定的圆满成就的潜能。如果沿着郭沂关于充分实现人类自性的主张,我们也必须提出一种能够为充分实现人性提供必要基础的自由理论,这是因为按照康德的看法,自由是道德的必需条件。如果我们赞成实现我们道德德性的首要性,那么我们就必然赞成它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否则我们的对话就没有意义。这样,我们可以用康德的语言来看郭沂关于充分实现人类本性的设想:实践自由的实现,必须与我们圆满的目的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为了改进实践自由的形式,这些目的是善的和有用的。通过它们,在最大限度地实现

幸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的德性成为可能。当然,这就是“至善”的理想。

总之,康德的实践理性和实践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现象生命和本体生命区别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语境中,他的自由理论,一方面以我们克服感官情绪的能力为基础,另一方面以我们先验地决定自我的能力为基础。他已经注意到,我们的生理生命使我们陷入一种能够腐蚀我们道德发展的必然性。和郭沂并无二致,他在道德基础上给予我们自由发展的特权。或者用郭沂的话说,我们生命存在的更高形式是我们的道德生命,我们必须首先发展我们生命存在的高级形式。

荷兰蒂尔堡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席保罗·柯本(Paul Cobben)教授在题为《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的认识》的报告中认为,道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十分相似。郭沂对中国形上学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个层面,即本体论、人性论和人心论。如果以之比拟于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本人如果在天有灵,大概也不会感到惊奇的。保罗·柯本教授将道哲学中道的两层含义,即作为世界本原的道和作为万物规律的道分别理解为作为绝对世界的哲学概念和作为有限世界的哲学概念。他指出,虽然郭沂提出的方案与黑格尔学派之间有着基本的共鸣,但通过其关于道的两种含义的论述,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共鸣界限。他认为他的老师扬·赫拉克(Jan Hollak)教授的黑格尔批判理论和郭沂关于道的两种含义的学说也是相通的。尽管黑格尔自称他的哲学体系发展了作为哲学概念的绝对世界,但事实上他仅仅发展了作为哲学概念的有限性(即人的)世界;他所自称的作为哲学概念的上帝,恐怕和有限的、作为哲学概念的人的世界更加密切。在黑格尔看来,上帝不可决定于一个被创造的世界。上帝的全能性意味着讨论上帝的自我实现是毫无意义的。上帝已经在亘古实现了自我。因此,神性的自由和人的自由是根本不同的。同必须实现其自由的人类相比,上帝和神性自由是不可被置于时间中的。在一定程度上,神的和人的世界看起来相当于郭沂关于一般价值(真善美)和被他称为安

的终极价值。和安相联系的价值,看起来更像表达一种境界而非活动。它们看起来相当于不必实现自我的神性的存在。然而,保罗·柯本教授表示仍然不清楚郭沂是如何确切理解神性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关系的。安作为终极价值“决定人的终极目的”。这是否意味着就像黑格尔关于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间关系那样模糊不清呢?或者说,由于安总是为人类所解释的,所以这两个世界仍然保持着分离状态吗?因此,他希望郭沂能够进一步阐述其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见解。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克里斯丁·柯瑞林(Christian Krijnen)教授在题为《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价值的理性基础》的报告中指出,郭沂的文章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方法和体系建构等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击中了哲学的核心问题。从康德到黑格尔、新康德主义者、胡塞尔以及当代先验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已经得到了深入发展,在相关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西哲学富有成效的讨论中,认真地将其纳入视野,是无可回避的。

三、西方哲学中的知识与价值

郭沂的论文在介绍道哲学建构背景时曾经谈到,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的知识,侧重自然知识和科学知识,其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与此同时价值悄然疏离和淡化。这种论断遭到与会西方学者的强烈质疑和批评。

保罗·柯本教授指出,郭沂将现代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危机联系起来,十分重要。的确,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片面地强调了知识。虽然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这种发展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他一方面同意这种对现代社会危机的诊断,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与价值的分裂,大概只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而不能代表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首先,从笛卡尔、休谟、康德来看,尽管现代西方思想的兴起与现代科学关系密切,但这种哲学的动机并非仅仅在于知识。其次,探讨理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关系、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其